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对康区的区域认知^{*}

罗宏 刘晓旭

内容摘要：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很长的独享期。康区作为连接西藏与内地的桥梁地带，是法国人进藏传教必经的一个重要区域。遣使会古伯察，巴黎外方会马伯乐、罗勒拿等人曾在来往信件和旅行日记中就康区区域认识有过很多讨论。古伯察、罗勒拿等人更是亲历康区，对当地交通有过详细记录。受早期欧洲关于藏地认识的影响，他们的讨论与记录存在诸多主观的成分，与历史事实存在很大的出入。这些错误的认识对西方影响至深，为以后川藏界务等问题蒙上了诸多阴影。

康区介居内地与西藏之间，其地理范围包括今西藏东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以及青海东南的大片区域，是连结内地与西藏，沟通西南与西北的桥梁地带。从1846年开始，法国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播进入了一个30年的独享时期¹。道光年间遣使会（Les Lazaristes）会士古伯察（Evariste Huc）、秦噶啞（Joseph Gabet）被清廷遣返而途经康区。期间，二人曾与时任巴黎外方四川传教会主教马伯乐（Jacques Léonard Pérocheau，又译贝罗书）有过接触，谈及这一区域地理和交通方面的诸多情况。稍晚，法国人罗勒拿

^{*} 本文的研究受到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和四川大学“从0到1”创新研究项目资助。

¹ 赵艾东：《1846-1919年传教士在康区的活动考述》，《贵州民族研究》2011（5）：184-190。

(Charles René Alexis Renou) 在与马伯乐多次沟通之后,选择由川、滇两地入藏考察。此举成为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传教士在康实地活动的典型事件。以上述几人为代表,法国人关于这一时期康区的表述一方面反映出当时欧洲对该区域和交通状况的认知程度,另一方面也对清季以来天主教在藏地的活动及策略,以及二十世纪西方势力在川、藏划界等问题上的认识和态度产生了十分负面的影响。

囿于史料的限制,国内学者关于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人在康区活动过程中的区域认知和交通探索的研究尚不深入²。笔者拟以现存巴黎的法文档案为基础,结合时人旅行记等相关资料,对这一时期法国人康区区域知识形成的历史脉络、各人意见及争论焦点、交通探索方面的具体实践等问题进行一个大致的梳理,并就其影响等相关议题做些许探讨。

一、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关于青藏高原东部的早期认识

十六世纪初欧洲列强逐步侵入南亚地区,对青藏高原西部及南部情况多有了解。十七世纪天主教开始涉足青藏高原地区教务,传教士多选择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进藏,由高原西部渐至拉萨。至十八世纪中叶,耶稣会(les Jésus)、卡普清修会(les Capucins)等以西藏阿里、日喀则、拉萨等地为中心,先后建立据点进行传教活动³。1745年因西藏僧俗的强烈反对,意大利卡普清修会撤离西藏,宣告了天主教在青藏高原早期传教事业的结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传教士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西藏,基本未涉足青藏高原东部的康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自然状况而言,康区险恶的地理条件使得传教士们心生忌惮;从当时社会环境来看,明末至清初朝廷严格的禁教政策增加了传教士们经由内地进入康区的困难⁴。

虽然如此,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们对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已经有所了解。这一点可以

2 目前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在对这一时期法国人进藏传教相关史实的梳理方面,比较代表性的成果有刘瑞云、赵艾东、向玉成等人的一些论文。参见刘瑞云、陈建明:《19世纪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内部关于成立西藏传教会的分歧与结局》,《世界宗教研究》2017(6):136-147;刘瑞云:《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罗勒拿藏区开教史实考》,《宗教学研究》2018(2):238-247;刘瑞云:《1848年清廷驱逐进藏法国传教士罗勒拿之外交交涉》,《世界宗教研究》2020(2):150-160;赵艾东:《1846-1919年西方人在康藏活动之基本认识》,《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11):97-101;赵艾东:《1846-1919年传教士在康区的活动考述》,《贵州民族研究》2011(5):184-190;向玉成、肖萍:《19世纪40-60年代中期法国传教士“独占”康区的活动及其影响》,《西藏大学学报》2011(1):74-81。

3 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347-352。

4 参见刘瑞云:《19世纪中叶拉萨宗座代牧区首任主教选立波折》,《西藏大学学报》2021(2):85-93。

从当时的西方地图中得到反映。十七世纪阿姆斯特丹、罗马、威尼斯等地出版的拉丁文地图中出现了“SIFAN”（即西番）一词，其中较早的如1655年左右由约翰尼斯·布劳（Johannes Blaeu）根据传教士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在中国的考察手稿绘制的《中国新图》（即《Imperii Sinarum Nova Descriptio》）⁵。“SIFAN”很明显是西方人对汉文“西番”一词的音译。这说明欧洲人最早接触到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知识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内地的汉文文献。从当时的地图来看，“SIFAN”常被标注于青藏高原东部临近今四川西北、甘肃西部一带的大片区域，范围十分广阔。在1660年左右阿姆斯特丹初版的一张地图中，该区域用拉丁文标记为“SIFAN ReG: Sive TIBET”，⁶意为“西番王国：或西藏”。类似的情况还见于1690年左右威尼斯绘制的一张意大利文地图，图中将这一区域标记为“SIFAN, O TIBET, R”。⁷由此可见，十七世纪的西方人对于西番的方位只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不十分清楚其具体的范围及与西藏之间的关系。

相较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欧洲涉及“SIFAN”的地图语言种类也更加丰富，除拉丁语外，还增加了法语、英语等语言。地图出版地点则增加了巴黎、伦敦、纽伦堡等。在具体表述上，大部分地图都将这一区域记作“SIFAN”。1796年伦敦出版的一张英文地图则将其标注为“SEE FAN”。⁸“SIFAN”一词在地图中出现的频率明显增高，但其所标注的区域与17世纪相比没有大的变化，仍然比较模糊。并且，该词常与“TIBET”一词随意地摆放在地图中，二者字号的选择也忽大忽小。这一情况说明十八世纪欧洲传教士和探险家们对青藏高原东部区域的知识并未有所增加。康区之于西方仍然是一块尚待探知的地区。

二、古伯察对“康区”和“西番”之表述

十八世纪中叶卡普清修会撤离西藏之后，天主教在青藏高原的活动销声匿迹长达一百年之久，至十九世纪中叶才重见其踪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遣使会会士秦噶

5 Johannes Blaeu, *Imperii Sinarum Nova Descriptio*, Amsterdam, 1655 circa.

6 Peter Schenk & Gerard Valk, *Iunnan, Queicheu, Quangsi et Quantun, Provinciae Regni Sinensi Praefecturae dictae*, Amsterdam, 1700 circa. 该地图初版时间约为1660年，1700年左右再版。现在通行的版本是1720年 Gerard Valk / Peter Schenk 的重印版。

7 意为“西番，或西藏王国”。Vincenzo Maria Coronelli, *Hunouang, e Sucuhen, Provincie della China*, Venice, 1690 circa.

8 John Barrow, *A General Chart on Mercator's Projection, To Shew The Track of the Lion and Hindostan from England to the Gulph of Pekin in China, and of their return to England*, London, 1796.

晔、古伯察二人经热河、蒙古诸旗、宁夏、甘肃，自行进入青海、西藏。二人于1846年初抵拉萨，在此居留近两个月后被清廷驱逐，途经康区到达四川，之后再经湖北、江西、广东至澳门。古伯察在被遣返之后，将其沿途见闻等整理成《鞑靼西藏旅行记》一书。书中关于康区的概念和区域认知曾有很多介绍⁹。其中，涉及康区的概念，康、西番两个关键性的词汇值得注意。古伯察在书中多次提及“Kham”“Si-Fan”的相关情况。

“Kham”一词则来自于藏文“ཁམས”（多用以指代康区）一词的转写¹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Kham”一词在书中并不单独出现，大多数地方都表述为“la province de Kham”¹¹，后者可直译为“康省”。在耿昇先生的译本中，该词被译作“康地”“康省”或“康区”。¹²需要说明的是，古伯察被遣返是在1846年，《鞑靼西藏旅行记》于1850年首次出版，其笔下的“康省”与清末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筹划设立的西康省二者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古伯察的这一认识可能是参照法国本土或者清代内地以省划分地方区域的做法，而将其借用到对藏地的记述中。

关于“Kham”所指的区域范围，古伯察也并未做明确的界定。根据其被遣返所经过的区域，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古伯察所谓的“Kham”当指今天的西藏昌都地区。《鞑靼西藏旅行记》一书记述作者被遣返至察木多（ཆབ་མདོ།）时，多次以“Kham”一词论及当地。书中写到：“察木多是康省（la province de Kham）的首府，建于被高山环抱的一个山谷中。”¹³可以看出，“Kham”被古伯察视作是以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县）为中心的一个行政区。书中还另外提到：“察木多喇嘛寺的住持是一名呼图克图喇嘛，他同时也是整个康地（Toute la province de Kham）的一名世俗官员。”¹⁴这里的察木多喇嘛寺当为昌都强巴林寺（ཆབ་མདོ་བླ་མ་གླིང་།），文中的住持则是第八世帕巴拉·罗桑济美班垫丹贝尼玛（འཕགས་པ་ལྷ་སྟོན་བཟང་འཇིགས་མེད་དཔལ་ལྷན་བསྟན་པའི་ཉི་མ། 1759-1847年）。该活佛为强巴

9 参见[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法文版参见 M. Huc, *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le Thibet et la Chine, pendant les années 1844, 1845 et 1846*, Paris : A. Le Clère et cie, 1850.

10 藏文文献中“ཁམས”的含义有广狭之分。广义上的“ཁམས”指包括安多和康区在内的青藏高原东部广大地区，狭义即指康区。“ཁམས”一般转写为“Kham”。

11 M. Huc, *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le Thibet et la Chine, pendant les années 1844, 1845 et 1846*, 1850: 453, 456, 506.

12 [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2006：553，555，581。

13 [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2006：553。法文原文参见 M. Huc, *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le Thibet et la Chine, pendant les années 1844, 1845 et 1846*, 1850: 453.

14 [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2006：555。法文原文参见 M. Huc, *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le Thibet et la Chine, pendant les années 1844, 1845 et 1846*, 1850: 456.

林寺第二十五任法台，总管当时察木多地区的僧俗事务，其权力的获得受到“北京朝廷封赐并由拉萨大喇嘛确认”。¹⁵ 古伯察在《旅行记》中同时对察木多下辖的硕般多的两座藏传佛教寺院的印经情况，以及当时察雅爆发的冲突做了记载。这些事务都被置于“Kham”地方事务的范畴。由此可见，古伯察笔下的“Kham”所指代的范围当为当时的整个昌都地区。

《旅行记》一书中与康区密切相关的另一概念则是“Si-Fan”。该词的使用主要见于秦、古二人进入青海，以及离开察木多后的相关游记中，特别是关于丹噶尔（今青海省湟源县）、青海湖、打箭炉（*དར་ཅེ་མཛོ*）等地的记述¹⁶。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古伯察书中“Si-Fan”范围主要指青藏高原东部临近内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是一个广义的地理范围。这一点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地图中“SIFAN”的大致范围基本是一致的。古伯察关于“Si-Fan”的表述和认识很明显是受到早期进入青藏高原的欧洲传教士和探险家们的影响。

然而，在论及藏地具体范围时，古伯察对“Si-Fan”的理解与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传教士们还是有所差异。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旅行记》中对“Si-Fan”和“Kham”二者的区别论述中。就所涉及的区域而言，古伯察笔下“Si-Fan”包括了今天安多和康区的诸多区域，是一个比藏地或藏族更常提及的概念。例如，他在论及塔尔寺（*སྤུ་འབྲུ་མ་དགོན་པ་*）正月十五宗教庆典时也曾有“Les Si-Fan du pays d'Amdo”（译为“安多地区的西番人”）这样的记述¹⁷。古伯察在谈及金沙江东部地区的语言时，称当地的语言“不再是在拉萨和康区（la province de Kham）所操的那种纯洁的藏语，而主要是出自西番（Si-Fan）民间的一种方言”。¹⁸ 可以看出，古伯察口中的“la province de Kham”是一个与“拉萨”和“Si-Fan”相并列的区域，且“Si-Fan”的语言也与“Kham”存在差异。根据上下文可以判断，金沙江似乎是“Kham”与“Si-Fan”的一条重要的分界线。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古伯察在谈及第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ཏཱ་ལའི་བླ་མ་སྐུ་ཕྱིད་བརྩ་གཅིག་པ་མཁའ་ལྷན་གྱུ་བླ་མ་མཆོ*）的出身时写到：“他出身于西番人（Les Si-Fan），出自明正土司一个贫穷

15 [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2006：555。

16 [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2006：305-589。

17 M. Huc, *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le Thibet et la Chine, pendant les années 1844, 1845 et 1846*, 1850: 97. [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2006：328。

18 [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2006：581。法文原文参见 M. Huc, *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le Thibet et la Chine, pendant les années 1844, 1845 et 1846*, 1850: 506。

而无名的家族。”¹⁹ 古伯察在这里认为第十一世达赖喇嘛是“Les Si-Fan”（即西番人），而没有说“Ssamba”（康巴人）²⁰，也与其对“Kham”和“Si-Fan”的不同界定有关。据此可以大致推断，《旅行记》中所谓“Si-Fan”的地域范围应该包含当时察木多以东至打箭炉一带的康区。这与当时藏、汉文献中所指的“ཁམས་”和“喀木”存在明显的区别，包含了古伯察本人的很多主观臆断。

秦噶毕、古伯察二人被遣返，是近代法国人首次实地接触康区。其经历和见闻，以及由此形成的康区认知存在很多失实的情况，但对法国宗教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时任巴黎外方四川传教会主教的马伯乐和西藏传教会第一次进藏的传教士罗勒拿。

三、巴黎外方传教会马伯乐康区认知之混乱

19世纪进藏的法国传教团体中，除了秦噶毕、古伯察二人所在的遣使会，另一支更为重要的力量便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1846年3月，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Grégoire XVI）谕令成立拉萨宗座代牧区（Vicariat Apostolique de Lhassa），并命巴黎外方传教会组建新的传教会以管理代牧区教务。至此，整个青藏高原的天主教事务得以统归巴黎外方传教会。按照罗马和巴黎方面的规划，新成立的西藏传教会（la Mission du Thibet）需由外方传教会下辖的四川传教会主教马伯乐选拔新任主教及传教士，并且由四川途经康区进入拉萨。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计划似乎只是罗马教廷和外方会巴黎总部一种纸面上的行动，在执行层面遭到四川传教会的强烈抵制，传教活动也并未立即展开²¹。在此过程中，教会内部围绕进藏问题有过许多争论，其中涉及到了康区的一些区域知识。

此时，教会上下关于整个青藏高原（包括康区）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巴黎外方会总部在写给马伯乐的信中也承认，整个青藏高原都是“一个基本尚未被探知的地区”。²²

19 [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2006：485。法文原文参见 M. Huc, *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le Thibet et la Chine, pendant les années 1844, 1845 et 1846*, 1850: 343.

20 古伯察书中的“Ssamba”在耿昇先生译本中作“康巴人”。参见 M. Huc, *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le Thibet et la Chine, pendant les années 1844, 1845 et 1846*, 1850: 342. [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2006：484。

21 刘瑞云：《拉萨宗座代牧区成立史实考述》，《宗教学研究》2016（4）：215-219。刘瑞云、孙蕊：《19世纪中叶法国巴黎外方会早期进藏活动史考》，《藏学学刊》第24辑，2021（1）：216-242。

22 A. M. E., vol. 171, Le ttre commune du 10 mai 1846: 179.

然而，为了敦促马伯乐执行罗马教廷筹备西藏传教会的谕令，巴黎外方会在信中谈及了一些之前该会在穆坪（今四川雅安宝兴县境内）方面的相关情况，谎称“卫浩尔（Verrolles）主教因他在穆坪修院的经历很了解（藏地的）情况”。²³实际上四川传教会虽然在川秘密传教多年，但一直未有大的进展，教会对于西藏和康区的情况仍不甚了解。其中缘由可能与当时清廷严苛的禁教环境，以及马伯乐的的个人因素有密切关系。马伯乐在川多年，一直致力于四川传教会的工作，坚决反对进藏传教。

马伯乐对于藏地情况的了解，与法国遣使会秦噶毕、古伯察有密切关系。秦、古二人被遣返途中和在成都期间，马伯乐与他们有过信件上的往来和接触。二人对马谈及了许多有关康区的见闻，特别是关于“西番”地区山川河流对进藏可能造成的恶劣影响等方面的情况。马伯乐后来在写给巴黎外方传教总会的信中，曾多次提及川、藏之间艰险的自然地理障碍，称途中有“70座可怕的、几乎是常年积雪的高山……常常有行人跌落布满积雪的深渊摔死……”，²⁴“那70座位于四川和西藏交界地带的巨大的雪山应该使传教士们尽可能地走其他的道路，以避免巨大的死亡危险。”²⁵这些信息的获得显然与秦、古有密切的关系。二人被遣返途中与一名原籍四川的驻藏官员李国安同行。后者向古伯察等提供了一本关于进藏站程等相关知识的书籍《卫藏图识》。此书曾作为清代驱逐廓尔喀入藏官兵的指南性读物，流传很广²⁶，在描述成都到拉萨途中需要经过的山脉时，恰好列举了70余座高山峻岭²⁷。这与马伯乐的上述说法十分吻合。

马伯乐关于当时康区知识的表述多反映在进藏旅途的艰险程度方面，而几乎未提及“Kham”等区域概念，更多的则是对“西番”（“Sy-fan”或“Sifan”）的论述。罗勒拿进藏之前，马伯乐多次与其谈及西番传教的种种问题。如1849年8月29日，罗勒拿在写给巴黎长上们的信中就称：“马伯乐主教阁下在最近给他（指巴班神父）的一封信中提到，是我又一次向他要求去西番（Sy-fan）传教。”²⁸而在第一个传教点的选择问题上，马伯乐提议罗勒拿前往龙安府（今四川平武）。罗勒拿借用此此前龙安一位传教士的话，对马伯乐的提议进行了反驳：“（龙安的）这些会口分布在陕西和甘肃附近，前往西

23 A. M. E., vol. 171, Le ttre commune du 10 mai 1846: 179.

24 A. M. E., vol. 527, Le ttre de Mgr Pérocheau aux directeurs du Séminaire de Paris, le 1 septembre 1847: 297.

25 A. M. E., vol. 527, Le ttre de Mgr Pérocheau aux directeurs du Séminaire de Paris, le 1 septembre 1847: 298.

26 参见赵心愚：《乾隆〈卫藏图识〉的体例特点及资料价值》，《上海地方志》2019（4）：71-80。杨学东：《〈卫藏图识〉作者、材料来源及文献价值考述》，《藏学学刊》第24辑，2021（1）：205-215。

27 参见马少云、盛梅溪：《卫藏图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七辑，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28 A. M. E., vol. 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u Séminaire des M.E.P., Hong-Kong, le 29 août 1849: 56.

番 (Sifan) 的路很糟糕。”²⁹ 可以看出, “Sy-fan” 或 “Sifan” 是当时马、罗二人论及龙安、打箭炉等川省周边民族区域时的一个常用概念。马伯乐在使用“西番”一词时, 概念所指非常模糊。这一点可以在罗勒拿的信中得到反映。罗勒拿称: “如果我不是被派到这些地方? 不管他 (马伯乐) 愿意怎样称呼 (这些地方), 或者 ‘西藏’, 或者 ‘西番’, 或者 ‘蛮子的’, 或者 ‘不文明的’。”³⁰ 由此可知, 马伯乐在指代藏地时, 对“西番”或“西藏”的认识可能并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区分。

康区地处汉藏之间, 跨越当时的四川、西藏等行政区, 对于康区内部区域的划分, 尤其是如何区分藏地和汉地、西藏与四川的界限也成为了马伯乐和罗勒拿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对此, 马伯乐在 1847 年 8 月 2 日写给罗勒拿的信中表示:

等您到了当地, 我认为您一定很容易分辨藏地和汉地的界限, 居民很清楚他们的土司是向汉地政权还是向西藏地方政权纳税; 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标志, 能够知道您是在汉地还是在藏地传播福音。³¹

马伯乐授意罗勒拿以当地纳税情况判断自己是身处汉地还是藏地。此番言论显然缺乏历史事实依据, 同时也反映出马伯乐对于康区内部的汉、藏之间族群界限并没有一个明晰的认识。而对于当时四川和西藏之间的边界, 教会内部“有人认为四川的边界是打箭炉, 相反, 有人认为是金沙江”。³² 马伯乐反对罗勒拿进藏, 面对罗勒拿关于在川及在藏不同阶段传教权的请求时, 他并没有予以正面回应, 只是称:

我的期望是您 (指罗勒拿) 首先在特别托付给我们的这个省 (四川) 的地盘上 (活动), 然后再在汉藏交界的地区 (活动), 最终,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再进入) 到西藏邻近四川的地方 (活动)。³³

天主教对传教士在不同区域的传教权限有不同的规定。马伯乐此番表述, 言外之意即罗勒拿去往何处、身处汉地还是藏地以及行使何种传教权限等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自

29 A. M. E., vol.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es M.E.P., Hong-Kong, le 29 août 1849: 53.

30 A. M. E., vol. 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u Séminaire des M.E. Hong-Kong, le 29 août 1849: 51.

31 A. M. E., vol.556A, Mgr. Pérocheau à Renou, le 2 août 1847: 21.

32 A. M. E., vol.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u Séminaire des M.E.P., Hong-Kong, le 29 août 1849: 58.

33 A. M. E., vol.556A, Mgr. Pérocheau à Renou, le 2 août 1847: 21.

行判断。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马伯乐对汉藏界线及康区地域的模糊认识。

上述情况的产生实际上牵涉到当时新成立的拉萨宗座代牧区的区域范围问题。1846年罗马教廷谕令成立这一代牧区时,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的谕令中只是表示“将上面提到中藏、³⁴前藏及与四川传教会毗邻的地区从西藏—印度斯坦宗座代牧区分离出来,成立以中心城市(拉萨)命名的宗座代牧区”,³⁵而并没有明确新代牧区具体的传教范围,加之巴黎外方传教会对于藏地情况的陌生,这就导致了马伯乐在讨论西番传教问题时,对汉地和藏地范围、四川和西藏边界等情况的混乱认知。

四、罗勒拿的康区探索及对区域的再认识

1847年8月罗勒拿从四川崇庆州(今四川崇州)出发,正式踏上了进藏之旅。作为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第一位进藏的传教士,罗勒拿的进藏活动前后有两次,时间分别为1847年8月至次年3月、1852年9月至1857年。在此期间,罗勒拿对康区打箭炉、巴塘(པཌཌ་ཐང་)、察木多以及云南涉藏地区等地进行了考察。1848年1月12日、12月28日,以及1849年8月29日,罗勒拿三次写信给巴黎外方会长上,述及其进藏情况及与马伯乐之间的纠葛。其中,许多内容涉及到他在青藏高原东部康区探索过程中的认识。罗勒拿对康区的区域考察,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 区域考察与边界知识的梳理

与马伯乐坚决反对进藏的态度不同,当时巴黎外方传教会内部一些狂热的传教士却极力主张进藏,罗勒拿即是其中一位。在与马伯乐谈及西藏传教会在藏地的活动范围时,罗勒拿极力主张要扩大传教区域。他表示:“我希望传教士也进入到那里,(这)势必给出一个比阁下(指马伯乐)表达出来的广阔得多的区域。实际上,这些大部分位于打箭炉西部和西北部的土司占据着广阔至库库诺尔的区域。”³⁶罗勒拿这里所指的要扩大的传教区域即包括青藏高原东部康区和安多的大部分地区。因此在第一次进藏期间,罗勒拿便对这一区域,特别是康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在此过程中,打箭炉、巴塘、察木

34 这里的“中藏”当是藏文的“卫”(ཁུ་ཁུ་)的翻译。在汉文的表述中通常只有前藏、后藏之分,很少有中藏、前藏之分。这里谕令将“卫”与“前藏”并置,反映出当时法国人对西藏地域概念的混乱认知。

35 Bref de Grégoire XVI pour l'érection du Vicariat Apostolique de Lhassa, le 27 mars 1846. In A. LAUNAY,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Thibet*, Tome 1,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01: 66.

36 A. M. E., vol.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u Séminaire des M.E.P., Hong-Kong, le 29 août 1849: 56.

多等地是罗勒拿关注的重点。

打箭炉是罗勒拿与马伯乐曾经反复讨论的一个地区。进藏之前，马伯乐极力主张罗勒拿以龙安府作为西藏传教会的第一个传教点，但遭到后者的拒绝。罗勒拿当时从语言、交通等方面考虑，认为打箭炉是一个比龙安更适合传教的区域。1847年9月初罗勒拿到达打箭炉，在此停留了一个月学习藏语之后，便迅速经由理塘（འི་ཐང་）到达巴塘。巴塘是罗勒拿进入藏地的第二站。罗勒拿到达当地的时间大致是在1847年11月。在巴塘期间，他一直计划寻求机会与当时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的首席噶伦（le premier ministre）建立联系，然而并未如愿。经多方打探后，罗勒拿于1848年2月离开巴塘，西行前往察木多，再次准备“邂逅”这位高官，但旋即被清廷驻当地兵站官员逮捕³⁷。

在第一次进藏活动失败后，罗勒拿计划由云南再次进藏。在四川代牧区副主教范若瑟（Eugène Jean Claude Joseph Desflèches）等人的支持下，罗勒拿于1852年9月底伙同传教士让·夏尔·法日（M. Jean-Charles Fage，也译作肖法日）从云南大理出发，准备前往滇西北地区。经过一年多的波折，罗勒拿最终于1854在崩卡（今属林芝市察隅县察瓦龙乡）建立起了西藏传教会在藏地的第一个传教点，并以此为基地逐渐拓展天主教在当地及青藏高原东南部区域的影响³⁸。

罗勒拿两次进藏，对当时四川与西番、川藏之间的区域界线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虽然早期西方地图和传教士屡屡提及西番，但该地与四川之间的界线长期并未明晰。罗勒拿于1847年9月初到达打箭炉，他在1848年12月28于香港写给巴黎长上的信中将打箭炉视作“四川和西番的边界”。³⁹而关于四川和西藏的边界，这一点实际上牵涉到当时罗勒拿在藏地的传教范围和权限。他曾就此问题与马伯乐进行过商榷。罗勒拿经过实地考察，提出“这两个地方——理塘和巴塘还属于四川管辖”，⁴⁰且“四川牢牢的统治着这条河（指金沙江）”，⁴¹从而澄清了当时巴黎外方传教会内部关于川、藏边界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并且，罗勒拿还将“察木多以及另外一个我在跨过金沙江之后经过的土司辖地”视作是“四川以西不被拉萨管辖的、向朝廷纳贡的地区，为汉地的边缘地区”。⁴²与此同时，罗勒拿还对法语中的“Thibet”一词所指代的区域进行了阐释。他提出：

37 刘瑞云：《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罗勒拿藏区开教史实考》，《宗教学研究》2018（2）：238-243。

38 刘瑞云：《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罗勒拿由滇进藏活动史实考述》，《西北民族论丛》2019（1）：114-140。

39 A. M. E., vol.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es M.E.P., Hong-Kong, le 28 décembre 1848: 11.

40 A. M. E., vol.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es M.E.P., Hong-Kong, le 28 décembre 1848: 11.

41 A. M. E., vol.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es M.E.P., Hong-Kong, le 28 décembre 1848: 14.

42 A. M. E., vol.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u Séminaire des M.E.P., Hong-Kong, le 29 août 1849: 59.

西藏的边界从哪里开始呢？真正意义上的西藏是什么？这个欧洲式的名字在中国以及我走过的地方都不为人所知。如果 Thibet 这一名字只指以拉萨为首府的区域，我就没有进入西藏。⁴³

可以看出，罗勒拿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对欧洲人建构的“Thibet”一词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种怀疑无疑是对西方既往藏地区域认识的一种否定。

（二）对康区交通的探索

古伯察被遣返途经康区时，曾论及康区的区域和交通情况方面的相关问题。他在《旅行记》一书中多次提及这一地区的大山大河对于康区道路的阻隔，强调康区交通对于传教士活动的危险性。他的这一看法对马伯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对此，罗勒拿以他往返察木多的亲身经历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

不应该仅仅依据古伯察与秦噶毕的描述就做出判定，（他们的描述）充满了对道路（艰险）的夸大其词，应该还原（道路）本来的价值。通过往返（察木多），我走了他们出藏之际所走过的大部分道路，它们（指这些路）不能说很美好，但是，那些汉官坐着滑竿从那里经过，他们的士兵每天都走这些路，那些商人赶着他们驮茶的牛群路过，它们比上述先生们（指秦噶毕、古伯察）所描述的要好走一些。⁴⁴

关于当时入藏的主要道路，进藏前罗勒拿本人及其他传教士也有提及。罗勒拿在写给巴黎的信中表示，当时去往打箭炉“最直接最安全的路就是商人和军队走的路，即荣经县（Yun-kienhien）的路或者是经过小金川的穆坪的路。安贝尔（Imbert）主教与卫浩尔（Verrolles）主教也思考过这一事业（指西藏传教），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马里埃特（Mariette）先生观点一致。他们认为打箭炉的路是最合适的，实际上也是最有利的。”⁴⁵可以看出，当时“商人和军队走的路”在罗勒拿等传教士眼中是比较笼统的交通线，在他们看来也是进藏较为合适的交通线。然而，罗勒拿进入康区之后，经过实地的考察

43 A. M. E., vol.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u Séminaire des M.E.P., Hong-Kong, le 29 août 1849: 59.

44 A. M. E., vol.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es M.E.P., le 28 janvier 1849: 26.

45 A. M. E., vol.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u Séminaire des M.E.P., Hong-Kong, le 29 août 1849: 55.

发现，当时入藏的道路有“官道”和所谓“便道”之别。“官道”即“从打箭炉一直到拉萨之外，中国人有一条结束于定日的军事线路，到拉萨共有 15 或者 16 个驿站，（每个驿站）有一位武官，级别高低不一，手下有几十个士兵……中国政府建这些兵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方便皇帝派往西藏汉官的行走以及（进出藏）官文的寄送。这种路就是我前往西藏并返回时所走的路，被人们称作大路或者官道（*grandes routes ou routes chinoises*）。”⁴⁶ 罗勒拿认为官道的劣势在于，它需要途经人口稠密之地，且大幅增加了进藏传教士的行程距离，同时，途经官道需要持有护照⁴⁷。相较而言，“有一种小路或者叫便道（*petites routes ou routes de traverse*），它们要直接得多，沿途要翻越的山脉也要低得多，这种路是汉藏商人常走的路……这些路在空旷的荒野中穿行，有时五六天都碰不到一户人家”。⁴⁸ 因此罗勒拿认为，“传教士不能走被称作官道的路，（官道）太危险，而是要走便道，他（指进藏传教士）将非常容易前往官道南北两侧大量的部族当中立足。”⁴⁹ 罗勒拿的这一观察为传教士进藏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这对于当时的巴黎外方会而言至关重要。

古伯察《旅行记》中对康区的交通也有过一些论述，比如他在察木多时，曾谈及当时察木多城左右通往四川和云南的两条道路。这是当时康区与东部地区联系的主要交通路线。罗勒拿在第一次进藏之后对此做了评估，表示：

我只认可四川的路是合适的。……云南的路过于受限，不能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一些地点相通。四川有好几条便捷的路，它们与所有从云南出发及不是从云南出发能到达的地点相通。但是，为了传教士们能够实施他们为西藏传教会所指定的（传教）计划，只让他们从四川（开展进藏活动）是不够的。⁵⁰

在第一次进藏活动中，由川入藏的路线是罗勒拿的首选。然而失败的经验使得他不得不对此重新考虑。第二次进藏筹备阶段，罗勒拿改变了之前的想法。他在向巴黎长上们的汇报中说到：“我们终于可以希望西藏传教会在云南边境上可以有一个安全的落脚点了，……从那里我们可以很容易与外界联系，并经由一些看起来没有四川那么危险的

46 A. M. E., vol.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es M.E.P., le 28 janvier 1849: 17.

47 A. M. E., vol.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es M.E.P., le 28 janvier 1849: 17.

48 A. M. E., vol.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es M.E.P., le 28 janvier 1849: 17.

49 A. M. E., vol.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es M.E.P., le 28 janvier 1849: 16.

50 A. M. E., vol.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es M.E.P., le 28 décembre 1848: 14.

道路一点点进入西藏腹地（拉萨）……”。⁵¹可以看出，为避免重蹈前次由川进藏被捕之覆辙，罗勒拿此次进藏已经基本上决定放弃走四川的道路。

另外，罗勒拿还以自身在打箭炉、理塘、巴塘、察木多等地的经历对康区各地之间的路程和距离做了记述。他说到：理塘距离打箭炉有“8天步行路程”。⁵²“巴塘，我急切的请求传教士可以进去以及实际上我在那里待过三个月，离打箭炉有步行15天的路程。”⁵³江卡则位于“巴塘过去5天路程的地方”。⁵⁴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罗勒拿的这些记述与古伯察的记录基本一致⁵⁵，但更为详细。

罗勒拿对康区交通的探索，是这一时期构成法国人康区区域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伯察等人途径康区是由清廷官兵护送，所经路线主要为当时朝廷官兵出入西藏的官道。为了避免清廷在入藏沿线所设关卡的盘查，罗勒拿对川藏、滇藏两线有过诸多评估，且其赴藏多借由便道。因此，他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法国人既有的康区区域和交通知识，同时也部分修正了后者有关康区区域边界的认知。

五、结语

康区地处内地与青藏高原交界的边缘地带。历史上汉文和藏文文献关于该地的书写构成了最主要的两种认识。十七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籍中多次提及“མཁའ་འབྲུག་ཡུལ་”这一藏族传统的区域和文化概念⁵⁶。清代的汉文史籍称这一地方为“喀木”⁵⁷。十九世纪中叶天主教上层开启了重返西藏的传教计划。有学者因此将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欧洲人对青藏高原的考察视作是西方对康藏地区的“发现”时期⁵⁸。这其中，法国传教士成为了当时的一支主导力量，其对康区的区域表述构成了汉、藏文献之外的第三重认识。

十七世纪以来欧洲人对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认知中，已经出现西番的概念，但这种认识比较模糊，西番与西藏二者时常被混淆。康区之于欧洲仍然是一块尚待探知的区域。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遣使会古伯察等人因被遣返途经康区，在他的记录中，康区与

51 A. M. E., vol.556, Renou aux directeurs du Séminaire des M.E.P., le 8 juillet 1852: 306.

52 A. M. E., vol.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es M.E.P., Hong-Kong, le 28 décembre 1848: 11.

53 A. M. E., vol. 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u Séminaire des M.E. Hong-Kong, le 29 août 1849: 55.

54 A. M. E., vol.556, M. Renou aux directeurs des M.E.P., Hong-Kong, le 28 décembre 1848: 11.

55 古伯察的记录参见了《卫藏图识》一书，并结合了自身经历。参见[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鞞鞞西藏旅行记》，2006：587。

56 高琳：《17世纪中叶-19世纪格鲁派史籍中的康地》，《西藏大学学报》2013（1）：93-96。

57 《清史稿》第12册，卷117，北京：中华书局，1976：3408。

58 赵艾东：《1846-1919年西方人在康藏活动之基本认识》，《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11）：97-101。

西番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界限,康区被用以特指当时以察木多为中心的地区,而西番则包含了察木多以东至打箭炉,以及安多在内的青藏高原东部的广阔区域。因涉及藏地教务,巴黎外方会内部关于康区的认识存在两种倾向:一种以四川主教马伯乐为代表,因反对进藏传教,其关于康区的知识多道听途说,对西番、西藏等概念非常模糊,对汉藏、川藏之间的界限也不清楚,以致进藏传教活动长期停摆。另一种以罗勒拿为代表,作为外方会首位进藏的传教士,他亲赴康区各地,对这一区域边界和道路交通等做了很多考察,对历史上欧洲既有的青藏高原区域认知提出了一定的质疑,并以打箭炉视作四川和西番的边界,以金沙江作为四川和西藏的边界。

综观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人关于康区的区域知识,其中多混沌粗陋之处,且臆构的成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康区作为一个单独的省。这种表述多次出现在古伯察的旅行记中。康区在清代汉藏文献中是一个传统的地理和文化概念,其所涉范围大体包括卫藏东部、安多以南,操藏语康方言的大片区域。这一区域分属当时的四川省、西藏地方、云南省等管辖,但并非一个单独的行政实体,更无行省之实。第二,以西番为地域概念,并试图寻求其边界。西番一词是历史上汉文文献中的一个人群概念,多用以泛指汉文化西部少数民族群。古伯察在《旅行记》中屡屡提及西番,并将其与所谓“康省”区别。罗勒拿多次与马伯乐讨论西番人,并且将西番概念地域化,且以打箭炉作为西番和四川的边界。这两种做法明显是对西番的误读。第三,对川藏边界的模糊与错误认识。马伯乐等人在川秘密传教多年,其活动的重心在川省内的汉人聚居区,巴黎外方四川传教会内部对川省边界模糊不清。罗勒拿进藏之后则误将金沙江作为二者的边界,与历史事实不符。实际上川、藏之间的划界,在康熙后期即以着手策划⁵⁹。雍正年间朝廷“驱准保藏”成功之后,于南墩之宁静山“山顶立界碑,又喜松工山与达拉两界山顶亦立界石”。⁶⁰《西藏图考》亦载,雍正年间曾“于巴塘西、察木多之东,勘定疆界,立界碑于南墩之宁静山。山以东属巴塘,山以西属藏地”。⁶¹宁静山是金沙江和澜沧江的分水岭。喜松工山是巴塘和江卡旧界。达拉山在盐井西南。由此可知,雍正时期的川、藏划界实际上是以金沙江和澜沧江中间的一线山脉为界限。这一划分直到清末才发生变化。

59 参见邓锐龄:《年羹尧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中国藏学》2002(2):78-89;赵心愚:《清康熙时期川、滇、藏行政分界的两个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9(6):143-149。

60 雍正朝《四川通志》卷21《巴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1081。

61 (清)黄沛翘:《西藏图考》卷3,《西藏程站考》,光绪丙戌秋刻本。

法国人关于康区概念和相关区域范围的错误表述，一方面是受到十七世纪以来欧洲既有的青藏高原东部模糊且混沌的知识的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传教士自身的局限，或者出于传教策略等的考虑，有意或无意造成。这些错误对当时及后世西方关于康区及整个青藏高原的认识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爱丁堡出版的一张涉及康区的西方地将图中，仍将“KAM or KHANG”标注在今昌都一带⁶²。另一张1889年的法文地图同样“KHAM”标注于此，并且记作“P^{CE} DE KHAM”，即康省⁶³。任乃强先生在《西康图经·境域篇》中指出：“近世西文地图所注之喀木（Kham）皆指察木多与三十九族等地言之。”⁶⁴关于川、藏之间界线的标注，同时期西方地图同样也是错漏百出。不仅如此，这些错误的认识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至为深刻。二十世纪早期“康藏划界问题，嚣然众口”。⁶⁵1913年至1914年西拉姆会议上，英国先是指使西藏地方代表就川、藏之间的界务问题向中央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后又以“调停人”的身份，抛出所谓“内藏”“外藏”的划界方案，遭到中央代表的强烈反对⁶⁶。英国人的这些荒谬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近世以来关于康区的许多错误认识，其中即法国人的康区知识的影响⁶⁷。这些认识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川、藏界务等问题蒙上了诸多阴影。

◆ 罗 宏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

刘晓旭 广州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

62 Archibald Fullarton & Co, *The British Possessions In The East Indies, with the Dependent Staes And Countries Adjacent*. Edinburgh, 1860 circa.

63 *Carte dressée d'après les travaux des missionnaires du Thibet*, par Adrien Launay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 1889.

64 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3：66。

65 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1933：1。

66 孙宏年：《20世纪上半叶西康建省与“藏彝走廊”地区的发展初探》，《藏学学刊》第2辑，2005：132-144。

67 近代以来，欧洲青藏高原知识的来源多与法国和英国有关。历史上英国由南亚涉足青藏高原，对青藏高原南部和西部有一定的了解。而法国人则长期活动于青藏高原东部，其关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知识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ABSTRACTS

"The Yak Mirror" and the Study of "Tibetan Handled Mirrors"

Li Yongxian

(Tibet University; Sichuan University)

Starting with the recent appearance of the "Yak Mirror" in Tibe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four handled copper mirrors found in the Yarlung Tsangpo River basin, including the "Qugong Mirror" in Lhasa. It is believed that these copper mirrors are early indigenous Tibetan bronze artifacts, influenced by the "Northern Grassland Culture" in terms of their design. Their metallurgical and casting techniques, as well as their mirror-and-handle assembly metho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uthwestern Aborigines Bronze Technology System" in the eastern plateau. They differ in technical origin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from the handled copper mirrors unearthed in the Langchen River basin in western Tibet. These mirrors hold significant regional importance for Tibet's "Early Metal Age."

Early Use and Smelting Technologies of Iron in the Ngari Region of Tibet: A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Iron Smelting related Remains Excavated from the Kaji Cemetery Site

LiYuniu¹ Sun Tianqiang¹ Zhang Mengyi² Li Shuai¹ Yang Feng¹

(1.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2.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Northwest Univers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the early use and smelting technology of iron in the Ngari region of Tibe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ron objects and slags that were excavated from the Kaji cemetery at Piyang-dongga village in Tsada county. The results of metallographic and elemental studies provide the first and earliest evidence of bloomery smelting technology in Tibet as early as the third century AD. The iron smelting technology and the excavated iron objects possibly belong to the "northwest system" and are probab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Plateau Silk Road.

Re-investigations of the Two Gtsang-Grong Steles in Drachee (Grwa phyi) of Central Tibet

Shawo Khacham

(Tibet University)

Gtsang-Grong steles are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ibetan history and the belief system of the early Phyi dar period. Although scholars have already studied these two steles, their basic results were not complete. Based on multiple on-site investigations, this paper combines historical records with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reviews previous studies,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wo steles, and proofreads all the inscriptions. The inscriptions reflect the revival of Buddhist teaching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hyi dar period, and the joint management of the monastery by monastic and lay communities. From the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the inscriptions and the events recorded on the steles, the author suggests the two steles were erected during the early 11th century. Influence from India and Central China can also be determined from the craftsmanship of the steles.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a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 of the *Historic Iron Credential Document of Tubo* from Western Tibet

Ngakon and Sonam Tsetan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Tibet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at Tibet University)

Recently, a "folk copy" of the so-called Historic Iron Credential Document of Tubo was found in Ngari, Western Tibet. The contents of the manuscript pertain to the decree granted by the Tsanpo Khri Srong lde btsan to his minister Rgye shin Khri dbang gtsug pud rje la khwe, and the subsequent inheritance of the imperial edict within the family. Although the imperial decree mentions historical figures like Mes Khri Sta'u snya gzigs, Khri Gnam ri srong btsan, Srong btsan gsam po and Khri srong lde btsan, along with their related activities, these events are not found in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making speculative interpretations unwise.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transcription and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manuscript, aiming to serve as supplementary research material for the history of Tubo period.

A Re-examination of the Gansu Section of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Li Zhipeng

(Shannxi Normal University)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served a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ang and Tubo. Due to the scarcity of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nd the ambiguity of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 has been limited in-depth exploration in the academic field regarding the routes and historical impact of the Gansu section of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This paper approaches the subject through the lense of documentary sources, cultural relics, folklore, and more, focusing on political interactions, economic exchanges, and cultural blending along the Gansu section of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It also discusses the roa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Tea-Horse Ancient Road and the Plateau Silk Road to provide a more objective overview of the routes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that occurred along the Gansu section of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Re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the Qinghai Route of the Silk Road

Cao Zhongjun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for Archaeology of the Silk Roads,
Northwest University)

The Qinghai Route of the Silk Road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eastern section of the Silk Road, and research in this field has spanned over eighty years. Looking at the existing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the main focus has been on case studies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relics related to the road, but fail to comprehensively sort out the relevant content within a unified framework. Most of them appear to be self-contained and lack integration.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provide a concise review and commentary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This includes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the Qinghai Route of the Silk Road, exploration and study of the road network,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research along the route, and studies of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habiting the Qinghai Route. With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ethnic theories, it is imperative to rethink and reevaluate the significanc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reflected in the Qinghai Route. In future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inity" of the Qinghai Route, explore new research approaches that combine ethnic groups and the route, and seamlessly integrate the study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with the study of route changes. This will contribute to a deep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ilk Road's Qinghai Route.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Baza Bridge in Lanzhou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hi Jianju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In the summer of the third year of the Yuanfu 元符 era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Song army abandoned Shanzhou 鄯州, retreated to Huangzhou 湟州, and repaired the Anxiang 安乡 Bridge in Hezhou 河州 and the Baza 把搦 Bridge in Lanzhou to facilitate support for Huangzhou. The Baza Bridge got its name from the crossing of the Yellow River at the Baza Ferry. It guarded two fortresses on both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ides of the Yellow River, which were later named Jingyu Pass 京玉关. The bridge was formerly known as the "ancient floating bridge" at the stream outlet Zhuolong 斫龙 and the "Guangwu Bridge" in Guangwu 广武 County of Lanzhou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Jingyu Pass consisted of two city gates,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city. The southern city was divided into an old city and a new city. The old city was Yijitan Old Fortress 益机滩旧堡, which was built in the summer of the third year of the Yuanfu era and was destroyed by an earthquake in the leap-month of March of the sixth year

of the Xuanhe 宣和 era. The new town was called Yiji Fortress, which was built in the sixth year of the Xuanhe era and was later renamed Anqiang 安羌 City in August of the same year. Baza bridge is situated 40 km west of Lanzhou and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controlling and guarding the routes leading west from Lanzhou to Miaochuan 邈川 City (Huangzhou), northeast from Miaochuan City to Zhuolong City, and northwest from Lanzhou to Liangzhou. It serves as a crucial inflection point for the study of traffic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Northern Song, Xixia, and Qingtang in Tibet.

An Examination of the Source of the Thangka of Milarepa's Life: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at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Liang Yunyun

(School of Art at Sichuan University)

The thangka depicting Milarepa's life, housed at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is currently known as one of the earliest thangkas of its kind. The author interprets the painted scenes in thirty sections and their inscriptions based on the biography of Milarepa, the *Rje btsun chen po mi la ras pa'i rnam thar thar pa dang thams cad mkhyen pa'i lam ston*, that was compiled by Gtsang smyon Heruka (1452-1507), alias Rus pa'i rgyal mtshan in 1488.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content of this biographical thangka of Milarepa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biography. The thangka illustrate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Bri gung bka' brgyud lineage from Milarepa, tracing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piritual legacy back to Milarepa's practice site at La phyi. This type of thangka was firstly created by Gtsang smyon Heruka and his disciples who incorporated elements from traditional Tibetan Buddhist narratives into its composi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thangka was to promote the newly emerging biography and songs of Milarepa.

A Thangka Set of Śākyamuni and the Sixteen Arhat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Lijiang Municipal Museum

Li Kai

(Sichu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The Lijiang Municipal Museum owns an old collection of seventeen Thangka Paintings depicting Śākyamuni Buddha, his two disciples and the Sixteen Arhats. These paintings exhibit a distinctive style, combining elements of both Han and Tibetan culture. They stand out with their rich Han-style influences

and a unique portrayal of birds, animals, and scenes of feasting. By comparing these Thangkas with another set of seven thangkas from the same museum's old collection featuring Tibetan inscription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is set of seventeen Thangka Paintings likely originated from the tenth Karmapa Chos dbyings rdo rje (1604-1674), a famous Tibetan artist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se two sets of Thangkas of Arhats represent a unique style known as "Han-style Thangkas" and serve as remarkable examples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that took place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cultures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with broad, multifaceted, and deep interactions.

Basic Demonstratives nə^{53} and tə^{31} in the Pada Tibetan

Song Xiao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t Nankai University)

The basic demonstrative system in the Pada (Dba' sde) Tibetan language consists of nə^{53} and tə^{31} . They are used as argument independently, and can also modify nouns in noun phrases. These two demonstratives may precede, follow or be juxtaposed to a noun within a noun phrase. Juxtaposition is typologically rare. Different demonstrative and noun orders have different deictic functions and referential meanings. Postposition is the dominant order in Written Tibetan. tə^{31} in postposition conveys definite meaning which is induced by pragmatic function. Preposition conveys distance and it is the result of grammatical system and language contact.

The French Missionaries' Regional Knowledge of Khams in the Mid-19th Century

Luo Hong and Liu Xiaoxu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Nanfang College, Guangzhou)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propagation of Catholicism by the French Catholic missions in the Khams area entered a prolonged period of exclusive influence. As a vital bridging area connecting Tibet and the interior of China, Khams was a crucial passage for French missionaries on their journey into Tibet. Notable figures like Evariste Huc of the Lazarists, Jacques Léonard Pérocheau and Charles René Alexis Renou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discussed and document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Khams area in their correspondence and travel diaries. Some of these missionaries, such as Huc, Renou,

and others, had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the Khams area and provided detailed records about the local transportation. Influenced by early European perceptions of Tibet, their discussions and records often contained subjective elements and deviated significantly from historical facts. These misconception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Western perceptions and cast shadows over subsequent issues related to the delineation of Sichuan and Tibet.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Boundary Demarcation of the Sichuan-Tibet Missionary Region by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in the Mid-19th Century

Liu Ruiyun and Fan Changlo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Sichuan University)

In order to exert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n Tibet, the Vatican established the Apostolic Vicariate of Lhasa in 1846, and sent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of Tibet to preach there. However, out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infiltration of western religious culture, bo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local authorities in Tibet strictly prohibited foreign missionaries from entering Tibet without permission. As a result, the Society's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were severely hampered, and it had to turn to the Sichuan Missionary Society to "borrow land" in order to gain a foothold. In 1858, Bishop Desmazes of the Apostolic Vicariate of Lhasa, Bishop Desflèches of Southeastern Sichuan, and Bishop Pérocheau of Northwestern Sichuan met with the diocesan circles of Sichuan and Tibet to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Society's missionary activities from Tibet into Sichuan Province. This meeting between the ecclesiastical circles of Sichuan and Tibet resulted from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s inability to enter Tibet. It also reflects the differences and disputes between the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factions within the church regarding the expansion of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China. Finally, it also shows that at that time both the Qing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Tibetan government strictly prohibited European missionaries from entering Tibet and spreading Catholic religious culture.

Recording Tibet: British Photography in Tibe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Zhao Guangrui and Zhang Zhir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Beijing Universit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British dominated the field of using images to document Tibet. The Western world's visual impression of Tibet was largely controlled by the British, especially by the border officials of the British Raj. Photography served as a cultural and artistic activity, a means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 important intelligence-gathering tool, and an effective visual medium for shaping the image of Tibet that was conducive to British interests. British diplomatic photography in Tibet concealed the power dynamics the British and Indian colonial governments hoped to convey in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ibet. It reflected the frequent contact between British representatives and Tibetan elites. These photographs could also portray Tibet as "distinct" in terms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British Tibetan photography was constantly re-selected and re-interpreted by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Some were deliberately highlighted, while others were deliberately downplayed or forgotten.